

## 信传 我的良师益友

○董贻正（1952 电机）

今年是张信传学长（1951 电机）逝世 10 周年。2007 年的 1 月份，我在贵州出差期间，同家里通电话时，我夫人告诉我，刘景白（也是清华学长，与张信传同班，原冶金部机动司副司长，后任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设备部部长）来过电话，说是信传在郊区参加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现在医院治疗。我急忙给信传夫人刘紫兰通了话，了解病情，告诉她我现在在外地，回来后再去探望。她说，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以为休养一段时间，能有好转。1 月 13 日，我出差回来的第二天，那天是星期六，我就去安贞医院探视，没想到护士刚听我说出名字，就说今天凌晨已经走了。我还以为病愈出院了呢。于是又问了一句：是



1980 年中国冶金经济考察团考察美国和奥地利钢铁业时的合影。左 1 董贻正，左 2 张信传

出院了？她这才明确地说，已经去世了。他女儿来办的手续。我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尽管我已听说，他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但见了熟人还是有反应的。怎么这样就遽尔西归了呢！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景白等老同学，报告了这一噩耗。

回家后，独自静坐斗室，过去都已淡忘了的往事一幕幕重新跳入了自己的脑海。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往事非但没有淡薄，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淀下来，我重新打开电脑，敲打着键盘，似乎又在同信传促膝交谈。

我同信传相识近 60 载。1948 年，我考取清华电机系，信传比我高一班，当时接触并不多，但相互也还认识。由于信传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学运工作，有意少选一些学分，因此虽然比我高一班，高年级的一些课程还是在一起上的，因此在校后期，就稍微熟悉了些。但是，真正从相识到相知，还是在毕业后。我们都先后分配在同一单位，开始是东北工业部，以后大区撤销，东北工业部成建制并入中央重工业部，1956 年，重工业部一分为三，我们又都留在冶金工业部。尽管后来冶金工业部改为国家冶金局，国家冶金局撤销后，又成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但我们还是一直在这一系统里的，因此从 1952 年到 2007 年，我俩共事了 55 年。特别是从 1953 年到

## □ 师友情

1958年，我们都还是单身，住在安定门冶金部的宿舍大院。我住在单身宿舍楼，他同刘景白、凌华椿住在家属楼4栋的一个套间。景白也是比我高一班的电机系学长，因此我们走动得比较勤。在周末，我常去4栋聊天，或者相约外出游览。甚至各人谈恋爱时，也相互参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家都很熟悉的原因。以后虽然各自成家，8小时外的时间接触少了些，但工作上的联系还是不少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入政策研究室，接触更多。对我来说，信传既是同窗学长，更是良师益友。虽然我不懂平仄，但是，我还是写下了自己有生以来撰写的第一幅挽联：

勤奋终生 诗文数百万字 立言立功还立德  
同窗三载 共事五十五年 知人知面更知心

### 才思敏锐 才华出众

我第一次领会到信传那种充满激情的才华，是在清华园内我们刚毕业时。信传比我毕业早半年，他是1952年初的寒假，修足学分后毕业的，分配到东北工业部。我们毕业时，信传从沈阳回到清华。我不知道是当时组织上有意请他回来对我们介绍东北情况的，还是他有事来北京的。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学聚会时，讲到东北大规模建设那种热火朝天的情景，那种意气风发、满怀激情的神情，也深深感染了我们。他当时还热情洋溢地表示，自己这几年要很好地结合工作，体验生活，争取在若干年后，也要写出像当时在青年学子中有很大影响的、描写苏联建设输油管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样的作品。虽然以后他主要精力放在对冶金工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上，没

有圆他文学创作的梦，但不时看到他出差期间写的一些充满激情的诗词，也可以感到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在这些诗词中，热情中不乏冷静。记得在“大跃进”时期，他曾跟随部领导到广西。当时各地都在放“钢铁卫星”，广西的鹿寨也是其中之一。回来后他曾在宿舍谈起鹿寨群众大炼钢铁的热情，现在我记得的只有当时他写的诗中一句：“鹿寨人人爱唱歌”，这也体现了他对人民群众乐观主义的赞颂。同时他又讲了小平同志视察广西时的一段话：你们炼铁很好。但这个铁是要送到上海去的，上海的炼钢炉是要吃好铁的，你们得想办法提高质量啊（大意）。这既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导群众走向更高的目标。信传向我们转述的这番话，其实也是含蓄地表达了他自己对大炼钢铁的看法。

在冶金部，信传是著名的“大秀才”“大笔杆”。当时冶金部很多重要文章以及冶金报的社论都是他执笔的。但是，使我对他的才情有进一步认识的，还是在1980年初的美、奥之行。应美钢联和奥钢联的邀请，冶金部派出由计划司副司长陈雷带队的考察组，先后考察美国及奥地利的钢铁工业，我同信传都参加了，历时一个半月。回来后由信传执笔写成的《赴美、奥考察冶金经济的报告》，受到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其第一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情况和经济研究”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上刊登，并加了编者按，评价颇高；第二部分“美、奥改造老厂的情况”，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作了批示：请宝华、马仪同志阅，并与冶金部认真搞老厂挖、革、改方案；第三

部分“今后20年中国钢铁工业需要考虑的几个战略问题”，全文刊登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一份业务部门组织的考察报告，受到这样的重视，也是不多见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信传观察问题的深度和视野的开阔。这份报告，对全程参加活动的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好的教材。

信传既有学者的严谨作风，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事物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高度概括。记得在大跃进时，他曾说起，在基层调查时，对当时大炼钢铁的现状，他用“小、土、群”作了概括，以后在全国流传很广。同时，他又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这在美、奥期间，也感受很深。在那一个多月中，几乎是每到一地，他都会即兴赋诗，潇洒挥毫，不仅受到华裔友人的欢迎，即使外国朋友，也为信传的龙飞凤舞的字迹而赞赏。近几年，他把自己的一生经历都用旧体诗的形式记录下来。我真诚地希望能将他的这些诗作整理出版，这不仅是对信传最好的纪念，也是我国冶金工业发展史的一份宝贵资料。

### 执着追求 为软科学研究殚精竭虑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到政策研究室；不久，部党组决定成立冶金经济研究所。当时，研究室就是我一个副主任；信传则是研究所负责实际工作的副所长（所长由陈雷同志兼任）。一天，唐克部长把我们两人找到一起，谈到今后这两个单位的职责任务，并说：“董贻正你该是遵命文学，张信传可以是自由论坛。”话说得很明确、很形象。政策研究室是直接为部党组服务的，要听命于部党组，不能自行

其是；而所谓“自由论坛”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要围绕冶金工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组织有关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信传确实是不负众望，上述美、奥考察报告，只是他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初露锋芒。此后，他接连主持了一批冶金经济的研究课题，在冶金界、甚至经济界都颇有影响。以后更是发展到与国家综合部门、有关高校、研究部门和企业共同承担国家级的大型研究课题，诸如“我国工业生产率诸因素研究”“钢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新时期大型工程管理理论和实践”等，其中有的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课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离休后的十几年中完成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唐部长对我们的“分工”而各干各的，相反，倒是相互配合，相互切磋的。尤其是在1987年起，我连续6年先后两届被聘为国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成员，与此同时，信传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的评审组成员，因此，在软科学领域同信传接触就更多了一些。有时在评审冶金方面的软科学项目时，也会邀请行业里的专家共同参与，信传是冶金行业的首选人士。他发言时所体现的在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底，以及对事物的透彻理解，常常使我自愧不如。在此期间，信传对冶金战线上推广软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也因此深深体会到信传对软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他不仅大力倡导、组织软科学研究，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由于他是工科出身，对经济理论没有系统的钻研，这一时期，他结合课题实际，恶补理论，还复习高等数学，再加上他长期深入实际，对行业以

## □ 师友情

及企业都有较透彻的了解，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冶金战线软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之一。

1998年，我应冶金出版社领导多次约请，选编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部分文章，包括对基层的调查报告、出国考察报告、专题论文以及一些评论性文章等结集出版，书名《管理——工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分上下册，共约70万字。我特地请信传为该书写序言，因为他不仅是我的老学长、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是我这些年来工作上的见证人，由他来作序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序言中，他表示感谢我“以知己相许的盛情”，洋洋洒洒地写了近五千字，结合他平时对我的了解，从为学、为文、为政与为人的关系谈起，涉及调查与研究、实践与认识、情况与政策、材料与观点的方法论问题，以及改革、发展与管理的宏观和微观结合的问题，不仅对本书的主题作出了很好的概括，还对本书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也使我受到很好的教益。对我既是鼓励，更是鞭策，使我深感：知我者信传也！

### 惜才爱才 助人育人

信传同志自己是位“大秀才”，但他绝无“文人相轻”的恶习，相反，却是惜才、爱才、唯才是举。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他找到我，谈起清华校友薛传钊的情况。她是清华经济系的高才生，但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安定门宿舍的家属五七工厂，至今仍然没有落实政策。陈岱孙老师听说后，很有意见。信传希望将她调到经济研究所，发挥她的长处。他让我向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后来，我向唐克部长谈了，

唐部长也很生气，要求该单位迅速落实政策。但是那个单位的领导却顶着不办，还强词夺理地说：现在薛传钊是厂里的骨干，已经落实了政策。信传和人事部门的有关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去交涉、说服，希望该厂领导能够放人，但是毫无结果。最后还是拿了7个大学生的指标，并且要求传钊同志在一年内写出一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以证明她的才能（这就是《冶金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一文的由来），才把传钊同志给换了出来。以后，传钊作为信传的得力助手，一起为冶金经济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上面提到的一些重大课题她几乎是全部参与了的，还曾独立完成了一些专题研究，其中有几项还获得了冶金部的一等奖。

还有一位清华的学长，曾被错误地打成“右派”，虽然早已“平反”，但党籍却没有恢复。当时这位校友是一家企业的生产调度，由于他的这种身份，开展工作有很大难度，因此想调出来专门搞些情报资料以及书面翻译这类工作，可以减少人事关系的摩擦。信传同我谈后，我就找了部里有关司局和政治部主管人事的领导，结果却是碰壁而回。尽管这事没有办成，但信传这种热心助人的行动却深深打动了。至于那位学长，亏得当时没有办成，后来为一位“伯乐”所荐举，最后挑起了国家领导的重任。

1998年，我的一个在基层工作、已经退休的亲戚针对上海房地产的暴利现象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文中引证了大量公开的统计数据，很有说服力。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篇文章很难公开发表。我推荐信传看后，信传同志立刻建议将此文转报镕基总理。当时镕基同志就任总理不久，提出了5个



方面的改革任务，房地产改革就是其中之一。我将此文压缩为2000字，与信传联名给镕基同志附了一封信。镕基同志很快就批给家宝同志及主管房地产的建设部领导。通过这篇文章，信传感到我的这位亲戚虽然学历不高，但研究思路对头，就鼓励她继续选准题目，继续进行专题研究。她也尊信传为老师。在信传的不断鼓励下，我这位亲戚以房地产为切入点，继而研究了中国的收入问题、第三产业发展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少精辟的见解，现在已经是某著名政治暨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员。2007年，某著名经济大报将她作为年度人物报道。

对我个人来说，信传更是一位良师益友。特别是我转入政策研究部门后，由于自己过去的经历，深感难以胜任。信传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使我逐渐适应新的工作。以后，我还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当代中国钢铁工业》一书部分章节的撰写。从提纲开始，他都认真参与讨论，提出建议，对最终的文稿更是逐章逐节审阅、修改、把关，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果然增色不少！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冶金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冶金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接触较多，我也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在信传以及其他老同志的带领和培育下，较快地得到成长，有的进所时还只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现在都已成为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

### 历尽坎坷 终上坦途

信传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后来自杀身亡，姐夫又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在那种历史年代中，不可

能不对信传产生消极的影响。在上大学时，曾经有一位相知颇深的女友，参加工作后，一直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在那不幸的年代里，却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尽管信传从心底深处不相信她会“反党”，但在当时巨大的压力下，最终只能选择“一刀两断”。这些事，以后都成为他历史上的大问题。好在他平时为人处事，以及工作态度等，都深为部领导了解，因此在每次运动中都能有惊无险地渡过。

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同部领导接触多，了解的情况多，就自然成为“造反派”关注的对象，都企图从他的嘴里挖掘出他们所需要的部领导的“反党”罪证。在这种情况下，信传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也不可能不犯常人所犯的一些错误，这又给他带来新的压力。1975年底，我调回冶金部，在政治部直属工作部，同信传在一个小单位里。当时我看到信传写的一篇文章，几乎是言必称“人民（日报）”言必称“红旗（杂志）”。一篇文章，没隔多句，就有一个括号，注明这句话的出处是在《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的哪篇文章。当时给我触动很大，我觉得不像过去我所熟悉的信传的风格。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使我感受到信传当时心灵所受创伤的严重；或许这也是为时势所迫，用以对付那时政治环境的一种策略罢。

好在很快粉碎了“四人帮”，信传又焕发了政治上的青春。此后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为冶金经济研究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生，直至倒在发言的讲台上！

信传同志，安息吧！

2017年4月22日